

港台文学过度开发之后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逐渐显现。大陆新一代出版人和读者,不再将港台文学创作看做是一个孤岛,开始将它置身于华语创作之中。

2008年,《聆听父亲》成了大陆出版界吃的第一只“螃蟹”。

该书出版单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编辑沈宇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了其中的始末:“当时,我们的编辑已经发现读者有港台文学作品阅读的需求,知道他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更多地了解港台。”

但是编辑们认为,20年间未见新港台文学作品的大陆读者,还是希望看到港台与大陆之间有联系的作品。否则他们之前的阅读和生活经历将不足以支撑他们读懂作品。于是他们选择了以家族史方式写家传故事的《聆听父亲》,因为这容易唤起大陆读者的共鸣。

除此之外,沈宇告诉记者,选择该书还有另外的原因:“港台人会因所处位置不同,有一些与我们不一样的观点,也会有一些诸如总统府、外交部等他们约定俗成的称呼,这使有些图书很难通过出版审查。”

选择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就体现着世出版方吃螃蟹的智慧,因为该书作者张春祖籍山东,是“台湾外省人第二代”,且政治面貌属泛蓝阵营。

当然,张大春在台湾文学界地位较高,作品被各阶层广泛接受,这也是该书在大陆一炮而红的助力。

自此以后,港台文学出版热潮袭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新经典文化、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漓江出版社等出版单位都加入到港台文学出版的行列,这是当初摸着石头过河的世纪文景不曾想到的。

港台文学的独特之处

“没想到市场会变得这么大,我们以为人们对港台文学作品感兴趣。”沈宇最初也颇为意外。当然这偶然间也有必然。

从事港台文学创作的人都涉足过影视、音乐等其他领域,身份比较多元。比如张大春不但写过剧本、为音乐填过词,还在出版社当过编辑,现在在电台当主持人。比如朱天文是台湾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早在1983年,她就凭借与侯孝贤合作改编成剧本《小毕的故事》,获得第2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在沈宇看来,身份多元的他们,在文学作品还未与大陆读者见面之时,就凭借其他领域内的成绩在大陆读者面前“混了个脸熟”,甚至有了固定的粉丝。

“看过她编刷的电影,感觉不错。现在她的书来大陆了,当然也想看看。”这或许道出了一部分大陆读者的心里。

文学是一面磨得很亮的镜子,能折射出当地的社会生活发展。由于港台社会经济发展较早,城市化进程较早,呈现出的社会面貌更加多元,使得很多大陆读者希望从阅读港台文学作品中借鉴经验。

破解出版之困

如果说自《聆听父亲》出版,港台作家在大陆图书市场有一个所谓的补偿性反弹,那么,从2012年开始,大陆读者的补课似乎就已结束。

“这两年港台文学作品市场热度明显下降。”沈宇说。

在他看来,港台文学作品就像是一种矿藏。在港台地方较小、产出并不丰富的情况下,过度开发很容易带来快速的衰落。

沈宇举了个例子:“比如有作家写了8本书,4个出版社各抢2本,在两年内把他们全部出完。我想,很多人不会再想读他的书。因为一个作者几十年的生活积淀就在这些书里,而一个人的作品风格又比较接近,甚至会有重合的部分,所以短时间内总是读到这些东西,很多读者都会读厌。”

引进新作家的作品看似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又产生新的难题。“因为他们在大陆的影响力很弱,引进他们的书籍,出版方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做宣传。而他们的作品积累还不够,很难稳定在一年出一部作品,等他下一部作品面世时,读者很可能都忘记了他是谁。”

而与此同时,随着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放开,大陆读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想读到最新最全的书。

基于读者的这种心理,目前,沈宇所在的世纪文景都是引进一些特别的书。比如,在台湾已经绝版多年、不易买到的书;比如虽在台湾出版过,但在大陆出版时会对内容进行最新增订的书;等等。

今年在内地出版的《吉隆春秋》就属这种情况。它与一般的港台作家不同,出生在英属婆罗洲沙撈越邦古晋市(今马来西亚)的李永平,除了台湾情怀、大陆情怀,还有着婆罗洲情怀,这也是世纪文景另辟蹊径的破局之法。

骤然过热的港台文学正在逐渐回归理性,既不像几年前那样火爆,也不会是从前那般绝缘,而是走上细水长流出精品的道路。

编辑荐书



《诗经现场》(精集),流沙河著,新星出版社 2013年5月

流沙河说:“今人写诗,不论旧体新体,想写就写,方便得很。”而“退回到2500年前去,那些古代诗人就太笨了,他们不能想写就写。总要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方能写出诗来。《诗经》305篇全是这样写成的。每一篇诗,背后总有一个事件正在发生。既然有事件在发生,那就必定有一个或多个现场。钻进一篇诗的字里行间,我们总能找到现场,看个清楚明白。诗虽深奥难解,读者只要来到现场,知悉发生了什么事,就读懂一半了。”

于是就有这本《诗经现场》。作者从《诗经》中精挑细选81篇诗章,以还原现场的方式,为读者讲述了每一篇诗背后的故事。



《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姜洪军著,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雷军是一个可被视为近20年来中国IT互联网业演进图谱的人,参与和见证了中国IT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素有“中关村劳模”和“中国IT界活化石”之称。

凡客、多玩、卓越、乐淘、UCWEB、长城会、7K7K、尚品网……雷军投资的这些公司组合之后总资产近200亿美元,几乎是阿里巴巴市值的3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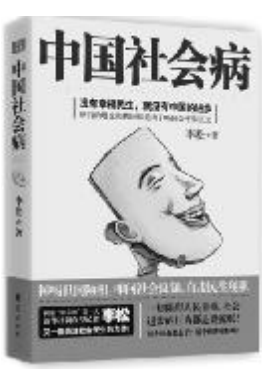
本书通过解密雷军20余年的商业奋斗生涯,再现了中关村乃至整个中国IT业的发展历程。



《江青的往事》,江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本书是舞者江青的回忆录。全书主体由9篇回忆性文章组成,依次讲述了童年、舞校生活、初入影坛、明星生活、回归舞蹈、难忘的演出与合作等曲折经历和内心波澜。

江青原名江青,1946年生于北平。1970年回归舞蹈之路,学习现代舞。1973年在纽约创立“江青舞蹈团”。她的舞台创作演出包括:纽约古根姆博物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伦敦Old Vic剧场、瑞典皇家话剧院、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瑞士伯尔尼城市剧场、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中国国家大剧院等。



《中国社会病》,李松著,华夏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该书是揭露“驻京办”黑幕第一人李松新作。若拿李松之前的作品《隐性权力调查》与新作《中国社会病》相比较会发现,前者62篇文章标题中,仅提到“官”及“官员”二字就多达23处,是不折不扣的官员隐性内幕调查,而《中国社会病》直指民生现状,看似与隐性权力没有直接关系,但追本溯源,这更像是“因”“果”之论。

作为一名调查型记者,李松继续着他特有的敏锐嗅觉,对社会百态作“典型而深刻”的扫描和分析,而且还尝试着做一名“社会医生”,与他采访的大批社会精英一起寻求治疗之道。

栏目主持:喜平

郎爸三十年的陪读历程

■本报记者 易蓉蓉

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地区,郎国任看见了一片美丽的树林。这片树林长得整齐茂密,所有的树看上去似乎都差不多大小。

可是,郎国任发现其中有一棵树长得特别高大,树冠也格外茂盛,像一把无比巨大的伞,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树。这棵树仿佛横空出世,给了郎国任强烈印象,一下子想到了郎朗:郎朗不就像这棵大树一样吗?他成长得快,迅速地蹿了出去,比别人吸收到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各种营养,自然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执著郎爸造就钢琴王子

《我和郎朗30年》作者郎国任以亲历者的身份,第一次全面解读钢琴王子郎朗30年成长和成功历程。

郎国任完整介绍了自己从郎朗的教育者、帮助者、郎朗辉煌成就的见证者,最后成为一位成功的钢琴教育家的过程。让读者懂得,怎样做一个成功的家长,特别是成功的父亲。

郎国任是一个非常好学和执著的人,是个有智谋的家长,也不断地影响着郎朗。郎国任陪郎朗学琴,郎朗就是郎国任的一切,就是他的生命。如果郎朗缺某样东西,郎国任知道从哪位老师那里去补充,甚至去“猎取”。实际上,郎国任已经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很多家长家的榜样了。

父子两人因为书的写作勾起内心的激情。郎国任30年来第一次向郎朗说“儿子,我爱你”;郎朗看完书稿后,泪流满面,说出了“爸爸,我爱你”。他为书出版深感情:我很幸运,拥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活着就要创造奇迹

在30年的陪读历程中,郎国任总结了教子心得:“做家长要有四心——爱心、耐心、恒心和信心。这四个心,缺一不可。首先要有爱心,一是对自己孩子的爱,还有就是对孩子所学专业东西要有兴趣。还要有坚定的信念。活着就要创造奇迹。”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郎国任说,在教育郎朗的时候,绝不能把自己的毛病,尤其是虚荣心带给郎朗。要在她面前做好表率,做一个完美的父亲。

每次上课,郎国任跟别的家长不同,他既不拿笔做记录,也不用录音机。他在旁边专注地听。“老师教的我先吃透了,才能更好地辅导郎朗消化吸收老师教的。因为成人比孩子理解力更强,家长理解了,会更好帮助孩子消化吸收老师的教学,这样的学习是高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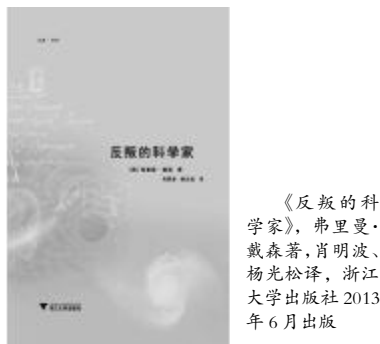
聪明来自于热爱,也来自于积累。郎朗今天能弹50首协奏曲,来自于从小积累和训练。

郎国任每天骑摩托车接送郎朗,风雨无阻,时间上也卡得特别紧,非常准时。每次送郎朗到校,郎朗是踩着铃声走进教室。如今郎朗日程的安排以分钟来计算,从来不迟到,不耽误事,非常守时,讲效率。

每次重要的考试和比赛前的头天晚上,郎国任都要搂着他睡。郎朗进场,郎国任就拍拍郎朗的后背:“上!你是最棒的!”而当郎朗有点过于兴奋了,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就拍拍他的背:“这才刚刚开始呢!”

《我和郎朗30年》,郎国任著,现代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书里书外



《反叛的科学家》,弗里曼·戴森著,肖明波、杨光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跟斯蒂芬·霍金和几年前过世的约翰·惠勒类似,今年已九十多岁的弗里曼·戴森身上虽然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罩着,但在物理学界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其地位和影响与诺奖得主相比丝毫不差。

早些时候有一种说法,认为戴森在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理应获得诺贝尔奖,至少应该获得比现在更高的荣誉。

当然,不乏另外一种解读。一部介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其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谁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对戴森有这样一番议论:“他不能投注全部心力只做一件事。他既是粒子物理学家,又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理论数学家。”

而戴森本人则这样为自己开脱:“我脑子没有年轻人快,跟他们一起凑这个热闹(指超弦研究)不太明智,所以,我选择做一点不那么热的工作。”

阅读分享

郝振省:值得用心读的“大厚书”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郝振省 2006年获“韬奋出版新人奖”。现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伟人在书中

在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气度和风格,给郝振省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作为政治家,涉及到核心利益时,他是非常坚定的。”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驻军问题上的坚定态度让郝振省记忆犹新。

“当时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表示:只要香港回归就可以考虑不派驻军队,但他不同意。他在会见香港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个重要场合非常生气且非常坚定地宣布:‘向香港派驻军队的问题是主权问题,是不可商量的。这个问题其他领导说的不算,那不是中央的意见。’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很多。这事儿说明他老人在原则

“用一个生命来写另一个鲜活的生命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史。”这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对傅高义用时整整十年著成《邓小平时代》的由衷赞叹。

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

虽然傅高义与邓小平仅在美国有过一面之缘,但没有零距离进行交往,这本传记写得客观真实。“如果小平还在世,他可以当着小平的面说:我是按照你实事求是的要求完成了对你的写作任务。”郝振省这样告诉记者。

因为傅高义为了写好这本书,用了十年时间作全面性的采访,“他几乎采访了国内外所有涉及到的当事人,也见了几乎所有邓小平曾接见过的外国政要”。为了更具说服力,他搜集准备了丰富的“物证”。

比如,邓小平十几岁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考勤卡,邓小平会见政要的速记记录,在郝振省看来,“这是许多研究者都不曾做到的”。十年间,傅高义要在邓小平曾经到过、工作过的每个地方住上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感受当年的历史和邓小平当时的心境。广西百色、山西八路军总部、江西瑞金……这些邓小平曾战斗过的地方,也留下了该书作者傅高义的足迹。

“厚今薄古和重事轻理”是郝振省看过该书后的第一感觉。因为书中用大量笔墨描写改革开放后的邓小平,虽然各种资料收集和亲身体验工作做得充足,使得史实描写充分,但在理性的分析上尚存上升空间。